

## 生命不能承受的“逍遥”之重



等6人正在讨论

## 1 语言之下,生活的真相

● 黄明姝:班宇在处理人物对话时不使用标志性符号也基本不分段,利用阅读的惯性使得情节自然流出。我们知道,即使采用默读的方式,声音依然能在我们脑海中形成。文字,作为一种符号在脑海里迅速被处理成语音和语义。班宇的机巧就在这里:在去除了冒号、双引号或分段这些书面语的标识以后,口语化的文本使得整个叙事在形式上模糊起来。《逍遥游》中谭娜与许玲玲吃草莓即是一例,等到对话结束草莓也快被抢完了,本该单独描写的人物动作直接渗透到了人物对话的领域。恐怕是受写作训练和东北方言的双重影响,同为铁西区作家的双雪涛也是如此,却不如班宇使用得这么具有流畅力。

● 王可柯:班宇的文字不做作、忸怩,不清嗓子就直接开唱。可以说,《逍遥游》的文字本身就归还了我们读者本该享受的阅读体验上的快感。而这通常在许多别的小说中被过多的意义和噪音给取消了。我注意到班宇的对话还有一个特点,写短句,有很多拟声词。这样的文字本身就是有声的,所以才能顺畅唤醒我们脑内的语音。正是如此,小说塑造的许玲玲等人物,才能拥有真实的质感,即使不声嘶力竭地煽情,也唤出我们这么多感性。

● 王玥:这个文本中最触动我的,是作家表现的一种“淤血”的人生状态——内里已经血肉模糊,外皮却依然还算完整。这种“淤血”的状态最典型的便出现在主人公许玲玲身上,突如其来的重要病将许玲玲一下子抛到生活的谷底;死神步步逼近,工作事业停摆,男友离去,与亲人好友之间又充满了隔阂。许玲玲对于自己濒临崩溃的生存境况是有知觉的,但她选择了一种无声承受的姿态,保持理智,克制自己,努力减少给别人带来麻烦和压力。这种人生状态实际上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们普遍的生存状态。面对压倒性的无解的命运,“许玲玲”唯有拼命保持自己生命的尊严和体面,坦然地行走在穷途末路,以示微弱的反抗。而在苦难面前,个体生命被迫向内挤压,却仍然不舍对他人生存空间的关怀和守护,这之中迸发出的坚韧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意志力,也很使我感动。

● 刘宇:行文中处处体现出许玲玲在生活漩涡中的矛盾挣扎,她安于命运的不公平却又常常不甘于此。许玲玲这个人物,在班宇的叙述中让我觉得疲惫而心酸,她只能瑟缩在自己的世界里,吞咽命运带来的苦和难,“想去环游,却虚弱无力”。她的哭泣与其说是发泄,不如说是面对人与人之间一切混沌和未知的情绪弥漫。

● 邹宜笑:在谈到人与他人隔膜之外,我认为人与自身同样存在隔阂。历史的偶然导致了命运的无常,人无法理解也无法抗拒这种由偶然触发并组成的自我的命运,于是产生了无力与惶恐。在这个故事里,个人的命运宛如一株形状肆意的树木,班宇在创作时不仅刻画这棵树的整体的形状,他更在意描述的是每一株藤蔓延伸的地方。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都在命运与时代搅混的泥潭里挣扎,希望能获得枯木自燃般的最末光亮,然而枝蔓们的拐点是未可知的,下一个命运的“拐点”或许更糟糕,以至于卑微弱小者的命运走向了更幽深的痛苦。

● 黄明姝:确实,《逍遥游》的完成度很高,那个作家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得到了合理且动人的阐释。我总想到《秋水》里的“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也总想到《庄子·达生》里的“涸者,当孔子问他:“何谓……成乎命也?”他说:“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至此,文学虚构呈现出它的巨大力量——我们是通过那些与世界取得和谐的虚构作品来理解世界的。就像我们至今不能摆脱《史记》或《三国演义》《红楼梦》的世界观的影响一样,历史、人性按照文学家所写的那样被我们记忆,并被用以理解真实的世界。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而这场讨论本身也印证了这一点。我们对许玲玲的看法其实都剥脱于班宇,而且不得不承认我们已经把它当做了一种“真实”。不必认为小说只是想象,也不必认为小说不能对现实提出任何教诲。

## 2 逃离之时,回归的指向

● 王可柯:其实之前我们都提到了小说人物的卑微、弱小。那么,如何归因这种困窘呢?作者在小说中是有这方面暗示的。许玲玲同学三人在成为生活的失败者之前,就都是高考制度的失败者。辽宁大综合高考改革大概是2003年开始的,这一年许玲玲高二,推算出来许玲玲正好和作者班宇是1986年的同龄人。许玲玲的经验就是高考制度建立以来的时代经验。我们很自然就能联想到身边高考失败的例子,因为太过自然所以反而会忽视其实这是一种大时代的创伤。普通人好不容易攀上的上升之梯,哪怕是一次轻微的抖动,都会引起坠落。

● 刘宇:小说的高潮部分是三人出游,许玲玲孤身一人登临澄海楼的瞬间,她从被压抑被遮蔽的现实中逃离出来,获得了身心的双重释放。登高望远,大自然的美景彻底融化了她的心,海天一色、云雾幻化,霞光披身,此情此景,让许玲玲想流泪,想被风带走,想纵身一跃,游向深海,从此再不回头。之前和赵东阳散步回家的时候,许玲玲曾说自己想当鲨鱼,因为在新闻里看到格陵兰睡鲨是活得最长的动物,如果说这里的她还期盼活着,甚至活得更久。那么登顶之后那一个瞬间的“道

逃”却让她想逃离,想解脱。哪怕下山之后病痛依旧得不到改善,生活还是那么艰难,但至少在这一刻她是满足的幸福的,被大自然紧紧地拥抱着。昙花一现般酣畅的“逍遥游”,也给许玲玲被病痛折磨的生命带来了短暂的美丽绽放。

● 邹宜笑:“逃离”正是这一批以老东北工业区下岗工人子女为主角的作品的共同主题之一,蒋峰《白色流淌一片》中的许佳明,即使少读一年只能考去四平师院,也要提前高考,他急于长大并离开所处的四平师院,鲁敏《六人晚餐》中的晓白与晓兰,前者带着对性别的惶惑,逃离了缺失父亲的家庭,后者以离开衰败的厂区为目标。包括双雪涛短篇小说集《聋哑时代》中的主角,名为李默的主人公,逃离的方式是用剪子剪破自己的喉咙,在死亡前先成为一个哑巴,逃离的同时抗拒阐释。时代的裹挟下,这一批年龄相当的少年,仰观父辈们被下岗,丧失了身份认同与个体价值肯定的痛苦,产生附着般的惶惑,不约而同地选择以“逃离”作为反抗的姿态。然而那些“逃离”的念头与他们终将无法摆脱的,同故土故人的血脉黏着发生了碰撞,矛盾无法和解,由无所避以及逍遥的不可得到。这始终不能算得上是胜利,却让我肃然起敬。

● 席思宇:我想“逃离”在庄子那是一种“超越凡俗”的态度,他所作的“逃离”是彻底的,他所言说的“逍遥游”是一种不喜不悲的对于无论谁包括自己的遭遇都不同情的超然,“逍遥”不仅是一种精神境界,同时也是他追求的理想的生存方式。生活在凡间的人们,无论怎样,终究都要面对摆在自己面前的生活,要读“逍遥游”,即若天方夜谭。许玲玲、赵东阳、谭娜他们三人都试图暂时抽离原有的令人窒息的生活,但最终都还是要回到现实,返回各自的生活中。

● 王可柯:对庄子的《逍遥游》的理解还有待商榷,回到文本,也许不仅是庄子说的“逍遥”,许玲玲连自己想要的“逍遥”都没有得到。小说最后,迎接慢慢走来的夜海。我认为许玲玲接受了生活的失败,以一种真正坦然的姿态认识到失败的必无所避以及逍遥的不可得到。这始终不能算得上是胜利,却让我肃然起敬。

## 3 小说家必须扶摇而上

● 黄明姝:现当代很多小说中都嵌套游记,与《逍遥游》同在《收获》榜单上的《基本美》也有。相比之下,《逍遥游》的一个动人之处恐怕就在于它持久地唤醒了那种感悟自然山水的古典基因。然而,其中的悖论在于:一旦将情感与智识完全沉浸于其中,我们就很难再将其视为一个对象去认识了。恰如我们的讨论始终沉浸主人公是否能获得逍遥一样。“逍遥游”三个字,仅仅是一个标题、一些呼应(比如“格陵兰睡鲨”),就足以使我们获得足够的信息——“逍遥游”唤醒了我们文化认同中最熟悉的部分,也左右了我们对于文本表述的知觉。

● 王可柯:班宇了不起的地方也许就在于,他一方面让我们相信他提供的文本现实,一方面他自己又作为世界的虚构者跳出来了。如果小说中的一切都是关于“许玲玲”的,那么有什么是关于班宇的呢?许玲玲也许是坠于海底向上仰望的鱼。她和别的鱼不一样,她很清楚地意识到鱼不是天生就要安

于海底的。他们也可以扶摇直上九万里。而班宇已然跃于现实的水面上,激起的波光也许就映在文本中的梦幻里。

● 刘宇:小说中两次写到许玲玲的梦,一略一详。第二次梦境相对清晰,梦中的许玲玲焦急而无力,她只能任由手中的雪糕化掉。许玲玲在梦中看着谭娜被绑架,急得快哭出来。母亲的缺失、母爱的缺位,让许玲玲极力想从谭娜身上获得更多安全感。现实中谭娜对许玲玲诉说着生活的不如意,而许玲玲却从自己的苦和难,她们之间存在着无法言说的隔膜,正如梦境中谭娜和许玲玲无法交流一样。这也许就暗示了无论许玲玲再怎么努力地去靠近,也摆脱不了彼此必然远离的结局,无论是醒着还是梦中。

● 邹宜笑:我注意到“湖”、“海”的意象在《逍遥游》中的不断出现。“湖”、“海”与“岸”相离,它是一个完全迥异于我们所处空间的异次界,或许这是班宇在小说中创造的安全地带,水的浮力带给我们轻盈感,一旦上岸,沉重的躯壳再次回归身体,恰如梦醒。然而尽管有这样一个暂避的空间,总是要出水换气的。班宇结尾处的那一点意犹未尽正印证了这一点,许玲玲蜷缩在车里,等待夜海缓步走来——我们正沉入水底,这是一个终局,也是一个始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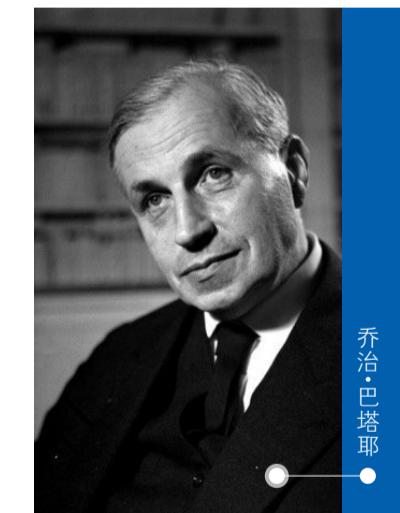
● 王玥:在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出神”的时刻。一些场景或意外事件撕裂熟知的日常生活,露出一两点梦境的微光,而班宇便是“借着些微光,复述或者创造一个世界,以区别于混沌、牢固的日常”。小说中许玲玲目睹道旁一棵枯树突然自燃,奇异的浓烟凶猛上升,直至枯树燃尽只剩一地灰烬。我不能说这是作家对一种荒蛮、毁灭之美的迷恋。自燃的枯树、梦境、湖海、格陵兰睡鲨,都是作家隐藏在文本中的stinger(彩蛋),当我们读到这里陡然驻足的时候,那幻梦的微光也就稍稍向我们露出一点真容了。



路杨

来自中国作家网 www.chinawriter.com.cn

## 巴塔耶:异质性与自主权



乔治·巴塔耶

对于异质性和自主权的执著探问。巴塔耶试图建立的“异质学”(Heterology)理论,首先是从对于“谋划”观念的批判出发的。巴塔耶在其人文学考察中发现,当人类开始改造自然,便确立了自己的主体位置,而由工具和制造物构成的新的人的世界,则成为了服务于人的对象。与这种转变相关的是一种被巴塔耶称之为“谋划”的思维模式,即现在时刻所做的事,一定在未来照应着一个“理应到来之时”,一定伴随着某种功利性的目的。直到那时,那些能够完成的劳动成果才能真正成为有意义的东西,才能被赋予价值。更重要的是,知性思考本身也是深受谋划观念束缚的。理性与科学所客观地观察、认识、论述的知性活动领域是主体加以捕捉的对象,因此,主体是不能完全作为自身的对象加以捕捉的东西,例如活生生的、未完成的或留有空白的经验,因其无法被对象化从而无法被加以捕捉和认识,只有被抽象化为能够划分和表述的对象,才能进入“知的领域”。在这种观念之下,就形成了一个同质性的世界。同质性即一种可通约的秩序。它看似体现了人类把握世界、将世界对对象化的主体性,实际上却在谋划观念下丧失了自主性。巴塔耶对于“谋划”观念和同质性的批判,正是对于由生产劳动出发的、“物”的逻辑和秩序的批判。从这样的批判视野出发,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巴塔耶开始在生产和分配之外,关注消费的环节,尤其是非生产性的消费——“耗费”的意义,关注在以物为中心的同质性世界之外,是否还存在异质性的领域。

与同质性相对,异质性所指的正是那些无法被主体对象化,无法进行划分和表述的领域。异质性包含了超出“我的意志、能力及思考”的部分,包含了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主体相联结的部分,包

的理性行为世界之间一直都有一种异质的关系,如果主体和理性自我建构的图景仅仅在于排斥暴力,如果理性的他者并不只是非理性或没有得到承认的东西,即不可通约的东西(除非理性主体发生破裂,否则,理性就无法接触到理性的他者),那么,我们就没有条件去设想一种理论,用来超越理性所能把握的世界,并揭示理性与一种先验的原始力量之间的互动;分析这种互动也就更是无从谈起”。换言之,哈贝马斯的质疑在于:如果异质性并不是全部呢?如果异质性也不能完全涵盖理性的他者,那么异质学也就无法完全超越理性或同质性所能把握的世界。在这里,哈贝马斯在巴塔耶的理论构造中发现了一种核心的悖谬处境,即知识、科学或哲学自身的悖论性:当科学或哲学将知识对象加以对象化的同时,也就将自我对象化了,而这必将造成自我的毁灭。

在哈贝马斯看来,面对“启蒙辩证法的漩涡”,巴塔耶的选择是以色情主义的写作实践自身的哲学观念,因为比之于充满悖谬、矛盾、震惊与奇特想象的文学话语,“哲学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打开语言世界”。这一点在巴塔耶以匿名写作震惊文坛的作品《眼睛的故事》与《太阳肛门》中能够得到鲜明的印证。巴塔耶在语言上使用了一系列双关语和语言的巧合,常常以纯粹的拼写上的联系构建表述,完全消解了任何可能存在的深层意义,从而彻底摧毁和溶解了文本。

对巴塔耶而言,或许只有文学写作才能借由“纵情沉迷于无所显现的语言”抵达异质性的领域,从而真正获得自主权。这是以理性为中心的科学与哲学永远无法做到的。因此,巴塔耶最终只能以放弃理论的方式实现自身的理论意图。哈贝马斯揭示的正是巴塔耶这一批判理论内在的“反理论”悖论。

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读书会由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指导,主要阅读内容为西方现代文学理论,重点阅读19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家、文学理论家的理论著作,主要做知识谱系的构建与相关文学理论的勾连,旨在建立参会同学的理论观念和问题意识,启发同学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

## 参考书目: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

Humanities Society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Georges Bataille  
人文与社会译丛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George Bataille  
(德语)于尔根·哈贝马斯著  
译林出版社

今天我们将要共同阅读与讨论的是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第八章“在爱欲论与普通经济学之间:巴塔耶”。

## 认识巴塔耶

乔治·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法国评论家、思想家、小说家,被誉为“后现代的思想策源地之一”。作为法国当代思想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巴塔耶上承尼采,下启拉康、福柯、鲍德里亚,引出对理性、主体和有限经济的批判视野。福柯称他为“他那个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苏珊·桑塔格称他是“爱欲与死亡的大师”。

巴塔耶1897年出生于法国中部奥弗涅地区多姆省的比昂。1914年,信奉天主教并开始写作,1916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患肺结核未上前线,并从此被肺病折磨一生。少年时期充斥着疾病,疯狂与亵渎的家庭生活,很早就为巴塔耶带来一种在崇高与不齿之间“误置滑脱”式的悖谬体验,使他开始以僭越、贬损和倒置看待生命中的一切,以不合常规的反转颠覆破坏律法的法则。青年时代的巴塔耶即产生了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目标,即建立一种自相矛盾的哲学的自觉,并将这种哲学付诸文学创作。对巴塔耶而言,战争期间所经历的孤独和遗弃正是生命与死亡的真相。在理论著作《耗费的概念》(1933年)、《内在体验》(1943年)、《被诅咒的部分》(1949—1951年)、《有罪者》(1944年)、《关于尼采——指向命运的意志》(1945年)、《论色情》(1957年)、《文学与邪恶》(1957年)之外,还有《眼睛的故事》(1928年)、《太阳肛门》(1931年)、《艾德沃姐夫人》(1937年)等惊世骇俗的文学创作。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讲,作为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巴塔耶“公认的特征在表面上是他作为‘色情作品’的作者,继承了萨德的黑色写作风格;但同时也是指他作为哲学家和学者,试图继承尼采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批评家所遗留下来的难以想象